

导论：开拓工业化 理论研究新视野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把前人的诗词名句连缀在一起，巧妙而形象地表示治学三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①也许，王国维的这般描述是对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而言。其实，不论学问大小，只要是真正认真做学问的人，想必或深或浅都会有这三重境界的体验。

笔者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就有这样的体验。最初，笔者开始做工业化课题研究时，对工业化范畴并没有怀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相当确定的概念，无需再在概念上费脑耗时。然而，翻阅大量理论文献后，到底什么是工业化，自己越来越糊涂了，因而对工业化的传统解释产生了怀疑。随着研究的深化，在百思不得其解中才骤然发现，工业化这个看似人人明白、其实纠缠不清的范畴，实在大有文章可作，有必要从基本理论层次上来一番梳理，以正本清源。任何理论体系都构造在基本范畴的基础之上，没有对基本范畴的透彻研究作基础，无论理论大厦构造多么精美都只是空中楼阁。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基本范畴的理论创新做起。

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

一、返本开新的理论再思考

关于工业化理论的研究，我国经济学界两度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建国以来的50年间，以改革开放起点的1979年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的研究基本上是照搬和模仿前苏联的工业化理论，或者换一个说法，是以斯大林工业化理论模式为基石。后20年的研究则以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为出发点，不断引进形形色色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学说，一边倒向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套用过去中国的一句政治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倒也颇令人玩味。不过，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工业化理论研究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且不说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中国工业化理论体系，真正扎实的理论思考也不多见，多如牛毛的是西方理论加中国情况生拼硬凑的八股文，充其量仍然处在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

对于斯大林工业化模式，历史似乎已经作了结论，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东欧和中国，都已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为时代所抛弃。然而，学术价值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建国初期，理论家们一味为斯大林工业化模式歌功颂德。改革开放以后，又一味地对其口诛笔伐。其实，以历史的眼光看，斯大林模式无疑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理论上也不失为独树一帜和自成体系。其历史合理性在于，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非常态经济发展理论。也正因如此，它必然随着经济发展由非常态步入常态而丧失生命力。

目前风行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主要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无疑也面临西方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能从中获得借鉴与启示。问题是：作为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西方工业化理论不可避免带有偏见和局限性，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也非较成熟的理论。中国的特殊国情，包括悠久的历史文化、现实政治制度和大国经济等特殊性质，这是西方工业化理论没有涉及的东西。因此，尽管国内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中采用西方的理论及方法已经成为潮流，但人们普遍感到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问题不大适用。尽管承认可以借鉴和吸收一些好的理论及方法，但可以断定中国工业化绝不能以西方理论为基石。

旧的理论基石被抛弃了，引进的新理论又不合用，寻找工业化理论新基石成为了当务之急。实际上，无论是斯大林模式，还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种种理论模式，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理论。因为，这两类理论都是以经济落后国家这一历史条件为前提，都是为追赶先进工业国而制定的理论及对策，并非研究的是工业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如果说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工业化就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问题，当然，工业化理论也就不能局限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狭隘的理论框架之内。只有以整个人类发展为着眼点进行的工业化研究，其理论才具有普遍意义。

一般工业化理论还有待创造，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理论更为迫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启动和进行的，前无古人遗训、后无同类楷模，的确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虽风险不小，但别无选择。作为世界上无以伦比的文明古国和人口最多的穷国，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艰难性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也绝不能企望有西方经济学家来为中国“度身订做”出一套工业化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理论来自实践又用以指导实践，这谁都会说。有人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有人

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还有人说“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但是，不管哪种说法，实践与理论都是分不开的，实践总是需要理论。中国工业化不能老是靠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总是靠“外来和尚好念经”过日子，中国需要创建出自己的工业化理论。当然，要理论创新，首先需要的是找到一块坚实的理论基石。

这块理论基石就是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笔者长期从事马克思的原著及经济学手稿的研究，深感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财富是一个仍然有待发掘的理论宝库，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更是一片有待开垦的理论处女地。

也许，有些人会困惑不解，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工业化”一词，哪来的“马克思工业化理论”？在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各种教科书及其研究专著中，只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等，哪听说过“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的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研究中，几乎从来不提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更没有人从工业化的角度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做过专门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工业化理论。例如，宋涛主编的《资本论》辞典》中，没有“工业化”的词条，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的“工业革命”一词也没收入辞典。各种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教科书、理论或学说史专著，以及《资本论》解说或研究之类的著作，无一例外都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当然更不可能专章专节论述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国内学者出版的为数仅几本的工业化专著中，也只是零星引述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没有专门探讨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也没有肯定存在一个“马克思工业化理论”。而且，翻遍《资本论》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找不到“工业化”一词，因而可以认定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工业化一词。由此看来，是否就可以断定马克思没有工业化理论呢？

“工业化”名词大约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显然马克思生活

的 19 世纪那个时代还没有明确的工业化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19 世纪就没有工业化范畴。首先，工业化以工业革命为起点，工业革命产生后就开始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工业革命起源于 18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19 世纪初，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到 19 世纪中叶，整个欧洲大陆以及北美也都开始了加速工业化。1843 年至 1883 年，马克思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 40 年，可以说正是世界上先进国家工业化的狂飙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而且工业化登上历史舞台约达百余年，马克思是不可能对工业化视而不见的。其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工业化”一词，但他在《资本论》及其它著作和手稿中采用过不少与此相关的术语。较为常用的名词有：“工业革命”、“大工业”、“工业国”、“工业制度”、“工业体系”、“工业方式”、“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等。其中，马克思使用最多的是“工业革命”和“大工业”两个概念。这些术语毫无疑问都反映着工业化范畴，或更准确地说体现着工业化范畴不同方面的规定性。再次，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经济关系是理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理论范畴，是人类思维中特有的逻辑形式，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反映。范畴既是一种思想结晶，又是一种思维工具。然而，客观经济关系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经济范畴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正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的：人类的物质工具的进化是循序渐进的，作为认识的工具，观念的进化也是循序渐进的。^①与工业化的历史演进一致，工业化范畴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最后，从范畴与概念的关系来说，范畴是更为本质的东西。范畴是对概念的最高的概括，一个范畴可以统摄着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既然范畴不等于概念，当然，没有明确的工业化概念，也不等于没有工业化范畴，不等于对工业化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科学

参见谢庆绵：《西方哲学范畴史》“前言”，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范畴是思维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作为人类反映客观实际的思维形式，范畴总需要用语言词汇确定下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但是，思维内容和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科学认识的革命与科学术语的革命更非完全一致。同一种思维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不同的思维内容也可以借用同一语言形式。在理论研究中，可以用旧的术语表达新的思想，即利用旧名词而赋予它新含义，也常见人们变换新名词表达的仍是旧思想。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哲学意义上是不难理解的。通俗的说法则是“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因此，不能以有没有“工业化”一词，来简单判定马克思没有工业化理论。

并且，目前人们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更不等于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中不存在工业化理论。恰恰相反，只能说是存在一个有待探索和开发的研究领域。而且，谁也不能否认马克思研究过工业化问题。只要读读（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章节，就可以确证这一点。如果仔细品味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不仅随处可见有关工业化问题的论述，也能从一些其它理论中剥离出工业化思想，从而归纳整理出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

当然，判定“马克思有工业化理论”和断定“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是工业化理论的基石”，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肯定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是工业化理论的基石，这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是从马克思工业化理论本身来研究，看其理论是否成熟和深刻；二是从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去把握，看马克思关于工业化的理论思考与其整个理论体系是否一致。关于这两个层面，涉及到的问题实在太多，这“导论”中暂时不便一一深究和展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4 页。

但是，上面的理论思索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改变传统的理论视野。不管怎样，既然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且马克思对工业化问题有相当的研究，而人们又极少研究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那么，就有必要开辟这块新的研究领域。

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以为这是老调重弹或陈词滥调。近些年来，国内经济理论研究中很少有人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了，至多只是贴标签式的带上几笔，甚至不少人惟恐避之不及。如果仔细思考“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潮流的变迁，也许你会发现，对现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有两大思想体系：一个是根深蒂固的孔孟儒教传统思想，一个是被推崇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学说。^①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两大思想体系或被打下地狱、或被捧上神坛，经历了一番颇为戏剧性的沧桑变幻。曾几何时，五四青年学子们高喊“打倒孔家店”，呼唤“德先生、赛先生”，于是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蔚然成风。相当时间内，讲台上教授国学的老师“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研究儒学的人更是心底郁悒苦不堪言。以至于 20 年代初国学大师梁漱溟挺身而出，慨然宣称：“孔子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②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新儒家们得到了翻身解放，而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反倒有些羞涩不能出口了，甚至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也不愿对人提这个专业名称，惟恐与马克思经济学沾上边。青年学者何清涟在谈其求学复旦经历时说：“当某位治《资本论》数十年，并在行内颇有名气的老学者去世后，

^① 这里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推崇，但马克思本人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其二，本书从纯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不涉及政治层面的“主义”问题。马克思晚年时，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他一再表态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6 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转引自黄万盛主编：《危机与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5 页。

他的几位研究生在参加追悼会后曾悄声议论：这个时候离世还避免了难堪，否则再过两年看到自己穷毕生心血所研究的东西竟被后来者弃而不顾，那才比死还难受”。^① 言下之意是这位老学者误入歧途，再研究《资本论》是不识时务，而非其研究不得法。学者的悲哀，莫大于毕生心血化作一堆不齿于人类的文化垃圾。但我始终认为，这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悲哀，而是把马克思理论当作教条的人们的悲哀，也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不学无术、却又狂妄贬低者的悲哀。如果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或者读过而没读懂，就对马克思的学说妄加贬斥，岂不可笑可悲。

用不着遮遮掩掩躲躲闪闪，马克思学说研究目前在中国的确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和冷落，相当多的人甚至于不屑一顾和逆反，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没有科学价值，而是过去政治化、教条化和神化马克思学说。其实，只要真正深入到马克思宏大的理论体系之中，其学识的广博、思想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治学的认真，有谁不为之惊叹和折服！即使是马克思的论敌，也无不钦佩他的智慧才华。即使是反对其学说的西方主流学派，也公认马克思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试问，一个半世纪以来，有哪一个理论家像马克思一样，其学说传播之广、影响之深，甚至影响了人类发展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呢？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古今中外有哪几个思想家可与马克思比肩而立？既然如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何羞涩之有？并且，学术本来就是寂寞的，大思想家更难为人理解，曲高和寡，自古皆然。被人误解，甚至被人曲解后利用，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的必然命运。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学说研究的低潮和冷落，也没有什么不好，

^①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2 页。

去掉宗教般的狂热，反而有利于真正的学术研究。

前面说了这么一大通，其意是“回到马克思去”，即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去寻找工业化理论的基石。20世纪70年代，西方理论界曾经兴起一股“回到马克思去”的思潮，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高潮迭起。^①且不论这种思潮的性质和效果，仅就其起因来看，就说明当代理论发展还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发掘思想武器，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像过去那样政治化、教条化和神化马克思学说，不仅不能找到理论创新的基石，而且还可能曲解马克思的思想，败坏马克思科学理论的声誉。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 J. A.）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虽然理论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今天，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还是要重新折回到马克思那里。熊彼特可不是随意说说，他不仅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最早主张回到马克思那里去的人，并且也是从马克思思想中得到启示而最有收获者之一。他创立的创新理论，就继承了马克思开创的关于技术进步在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的思想。^②其实不独是熊彼特，且不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研究体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和许多流派，其内容非常丰富也十分复杂。可参见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熊彼特是“不成学派的大师”。其实熊彼特创建的创新理论自成一个体系，对正统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忽视技术进步分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学流派。熊彼特本人的学术经历也很独特，他是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庞巴维克的学生，并求教于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希法亭和鲍威尔等人关系密切。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熊彼特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应该指出，熊彼特并不赞同马克思的立场，他甚至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但他承认马克思在学术上享有崇高地位。参见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许多当代著名的西方经济学权威，例如，琼·罗宾逊、斯拉法、卡莱茨基、列昂惕夫、布劳革和斯蒂德曼等人，也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许多富于启发性的思想。众所周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就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确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思想宝库，^①且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恶意攻击者除外），无数的探宝者都在进行着一种对马克思理论“返本开新”的工作。所谓“返本”，即返回到马克思理论的本根，以求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所谓“开新”，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发掘出新的科学理论。历史上真正富有独创性的思想体系，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并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被人们发掘出新意。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是这类体系中的最伟大、最具魅力者之一，因而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去返本开新。

研究工业化理论，是否也可以到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去返本开新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本书的全部研究就是要证实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最早系统地研究了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历史性变革，最早着眼于整个人类发展对工业化进行经济哲学思考，也最早较为全面地涉猎到了工业化理论各个方面，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因此，深入发掘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无疑可以开辟出工业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① 仅就马克思的著述的数量来看，目前还难以估量。前苏联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西方几国机构合作整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正本副本多达200卷，但现存放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所中马克思的大量手稿笔记仍未全部整理发表出来。1972年L·克雷德从马克思的这些笔记中整理出版《卡尔·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

二、新视野中的理论视角

记得大发明家爱迪生曾说过，“人像一块矿石，它在你手里暗淡无光，你只有从一定的角度才能看见它那深沉美丽的光芒”。看人需要选择角度，观察由人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当然更需要选择适当的角度。所谓理论视角，简单地说，就是理论分析的角度，或理论剖析的切入面。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像是一个奇妙的多面体，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去分析，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并且，当某个理论体系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同样也存在一个理论视角问题。特别是像马克思这样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无疑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深入发掘其丰富的理论内涵。

自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产业革命揭开工业化的历史序幕以后，工业化问题就成为了各国经济学家经久不衰关注和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各种理论层出不穷，研究文献更是浩如烟海。从早期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贝克莱、李斯特、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到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克拉克等等，从现代的霍夫曼、罗森斯坦-罗丹、库兹涅茨、纳克斯、罗斯托、刘易斯、缪尔达尔、舒尔茨和钱纳里等西方经济学中的著名人物，到列宁、斯大林以及当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有些学者，都在不同层面或不同侧面对工业化理论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披阅有关工业化的文献后，笔者发现，工业化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相关的理论散见于理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增长理论等许多学科之中，甚至对工业化概念也有天差地隔的解释。要讨论工业化范畴，无疑有必要首先清理一下理论背景，以确

立崭新的理论视角。

回溯人类历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社会中没有产生出经济科学，经济学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① 工场手工业时期，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起点；同时又是门德尔斯所说的“原始工业化阶段”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阶段”，^② 即工业化历史进程的前奏。为什么经济学产生于这个阶段？马克思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指出了寻找答案的方向：“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③ 由此看来，产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才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现代经济学，而此前的重商主义学派还不够格。造成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领域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包括技术变革、协作、分工等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变革和资本、雇佣劳动等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而这一系列的变革，为工业革命以及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是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从经济学的产生来看，经济学与工业化的确是有不解之缘。

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发展是与工业化历史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反映，而现实经济运动及其制度演变则构成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伴随着工业化从低级向高级、从一国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推进，经济学从古典时代、新古典时代、凯恩斯时代，走到了目前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人说，古典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404 页。

②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2 卷，第 86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376 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现代经济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

学是“经济学的哲学时代”，主要采用历史的和动态的分析方法，着重考察的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以及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变动着的宏观经济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正是由于把技术变动因素与经济利益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古典经济学建立起了一座既博大宏伟、又庞杂而不精细的经典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①其实，马克思所称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尔萨斯、萨伊和穆勒等人，也都属于古典学派。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的兴起，才标志着经济学发展进入新古典的“分析时代”。以瓦尔拉、帕累托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以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等假设为前提，采用数理逻辑推导进行完全竞争静态均衡分析，论证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福利的最大化等基本命题，建立了一整套公理化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理论以逻辑优美和体系完善而著称，其方法论上的变革使经济学走上了“精细化”和“实证化”的道路。然而，由于新古典理论建立在主张完全竞争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必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而破产。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革命”应运而生。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理论的教条，从经验观察看到的危机和失业的前提出发，运用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在三大心理规律和乘数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以有效需求和一般就业理论为主干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并据此提出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一整套经济政策。不过严格地说，凯恩斯理论仍然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并非对新古典理论的真正革命，而应看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凯恩斯之后，围绕对凯恩斯学说的补充和解释，以及张伯伦、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的兴起，经济学发展进入了古典与新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典两大范式的“争论时代”。^①

古典与新古典两大范式，也是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理论视角，即经济哲学分析和数理分析。古典范式强调从现实出发，新古典范式则强调从假设和公理出发；古典范式主要采用理论抽象和制度的历史分析，新古典则主要采用数理逻辑和物理学的均衡分析；古典范式注重定性分析而具有“人文”或“道德”色彩，新古典则注重定量分析而具有“数理”或“机械”色彩。瓦尔拉斯曾经给新古典经济学下过一个定义：“这种经济学纯理论是在所有方面都类似于物理数学的一种科学”。^②正是借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比较完美的“科学外表”，成为至今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主流。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也正在这里。由于其前提假设缺乏现实性和证伪性而难以成立，据此进行的逻辑推导及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必然远离现实，表现为是一种“智力实验”，而不能称之为科学。^③现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更是走到了极端，把经济学的现代化等同于数学化，正如产权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所说，使经济学成为了“象牙塔中的黑板经济学”。与新古典相反，古典范式认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绝对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实验室创造出理论的前提条件，也不可能真正“数量化”和“精确化”。因为经济活动是一种社会运动，而社会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大系统，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社会有机体”，是无法由若干数量模型来进行“模拟”或“仿真”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而

^① 参见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 页。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③ 参见科尔奈：《反均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批评，还可参见布劳革：《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非一些具体的经济变量之间的数理关系和简单化的数学符号。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上属于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以马歇尔体系为理论基础。就研究的内容来说，西方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以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为前提，因而不研究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主线，因而主要研究供给、需求和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即包括价格决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流通问题，基本上不研究生产领域里的经济问题。如果说古典学派使经济研究从流通过程转换到了生产过程，那么新古典学派则又把经济研究从生产领域拉回到了流通领域。因此，新古典学派所构建的经济学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其逻辑基础是机械主义的笛卡尔方法论，以几个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基本假设为前提，把经济活动与社会历史联系割裂开来，抽象掉了现实经济运动中的技术变动和利益冲突，因而在追求精细化中表现出深刻的片面性。^① 其实，作为新古典经济学鼻祖的马歇尔，也认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可惜，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彻底“见物不见人”，正如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只存在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反思。有人批评，经济学中流行的做法是基于偶然的经验、预感而建立不现实的假设和充满公式的封闭体系。有人认为，经济学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

^① 新古典经济学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稀缺的商品”来取代古典学派的“生产的商品”，用交换来取代生产与分配，用资源配置取代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用数理逻辑和物理学的均衡分析取代社会历史分析，从而构造出一套具有自然科学外表的逻辑分析体系。其稀缺性前提是以不存在技术进步的静态收益递减规律来保证的，一旦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必与稀缺性前提相矛盾。其市场自动调节的假定即完全竞争的假设，本身就直接包含了人们利益协调的假设，因而取消了生产关系方面的分析。其经济人假设和无差异增长假设等，都抽象掉了社会历史规定性。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柳欣的专著：《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的、从而是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以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还有人指出，当代经济学家始终回避不明确说明价值问题，使用精巧的技术语言掩盖了价值冲突，从而把经济学引入了死胡同。^①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进行系统的批判，继承熊彼特的传统，开始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体系，研究技术进步在微观经济行为、结构变动过程和宏观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从理论范式^②上看，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应该属于古典经济学范畴。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对象来进行经济研究的，而不是专门以工业化为研究对象。在《资本论》的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也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因而，马克思的研究又不可能不包含着工业化理论。这是由以下两方面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化的过程。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工场手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与工业化的历史起点并不完全一致，但资本主义真正的物质技术基础即机器大工业与工业化的起步在历史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工场手工业既是向大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与工业化在逻辑上并无矛盾之处。

^① 参见：阿·S·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学科中形成的共同的理论模型和理论框架，包括一整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规定。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说就是对工业化的分析。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充满着对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人类发展的深沉思考，他是通过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不是停留在对资本主义表面现象的描述，不是仅仅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而是包含着对一般经济规律的研究。如果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分成两个理论层次，即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理论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那么工业化理论也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一般工业化两个层次。其中，资本主义工业化理论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而一般工业化理论则是抽象资本主义特征后的工业化基本理论。对于笔者的研究来说，更有价值的当然是马克思关于工业化的一般理论。因此，要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就必须对马克思整个理论进行两级抽象，先是从理论整体中抽象出资本主义工业化理论，进而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理论中抽象出工业化一般理论。总之，关键是要把工业化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中剥离出来。因为，过去人们一谈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简单化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甚至简化为阶级斗争的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内涵的更精彩的思想，即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历史沉思。其实，这才是马克思学说真正的精华所在，也是马克思工业化理论的科学内核所在。

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著作讨论工业化问题，但在他的全部经济著作中又几乎无处不渗透着有关工业化的思想。因此，首要的原则是必须从整体上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理论，即从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及其工业化范畴与其它经济范畴的相互联系来进行分析。自从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后，就有人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列入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虽然马克思分析的主要是宏观经济问题，但也研究了不少的微观经济问题。例如，对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分析，就基本上是从企业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其